# 第一章

# 寒门英子

## 朴诚家风

湖北东北有一个黄安县（今名红安），这里是著名的“将军县”。据有人统计，红安县诞生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 62 位将军，4 位副总理，10 位正副部长，12 位大军区司令员和政委，23 位大军区副司令和副政委，24 位兵团级干部，130 多位省军级干部。这里还是两位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的家乡，曾任共和国副主席、代主席、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董必武就出生在这里。

董必武 1886 年 3 月 5 日（清光绪十二年农历正月三十）出生于黄安（今红安）县城南街（今城南正街）的“大井坎董家”。他来到人间不久，教私塾的父亲给他取乳名为乐益，直到晚年，董必武还把自己的书斋命名为“乐益堂”。

依照董族家谱的辈序：士、为、其、基、贤、良、绍、德，董必武是“贤”字辈，故取学名贤琮，字洁畬。15 岁时，据《尚书·大禹漠》“董之用威”语改名用威；取《汉书·律历志》“日月如合璧，五星如连珠”之意，号璧伍。参加革命后，他深信中国革命“非有武装不可”，故取谐音改“璧伍”为“必武”。后来，他还曾用过“碧吾”、“窥园叟”等化名。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董家原籍为黄安东邻的麻城县，祖先世代务农。清朝初年，他家这个分支迁居到黄安城南约 25 公里的永和镇傅董家村，后又迁至石家塝。到董必武前六代祖先董之谟时，从石家塝迁居城内。进城后，全家节衣缩食供子弟上学，自此董家开始有人读书，但连续三代均无人获得功名。在董必武曾祖父董为霖主持家务时，开始以小本钱在本县的武家畈经营一家小酱园，经售自制的酱油和腌菜，赚得零钱以养家糊口。其祖父董其元、大伯父董基浚，都继续经营这份营生，可谓世代相传。故黄安县乡里人又称他家为“酱园董家”。他们过着自给自足的生活，但一遇到灾荒年，营业额下降，生活也就困苦不堪了。

当时的中国，社会风俗讲究祖孙同居，共享天伦之乐，董家是个人丁兴旺的家庭。祖父董其元，膝下有 9 个儿女。董必武出生后，全家已是 30 余口的大家庭。其时正值清末，统治阶级腐败至极，物价飞涨，酱园生意很不景气。祖父董其元去世后，大伯父董基浚主持家务，这时酱园赔本，被迫停业。董家没有土地，只有一幢住宅。为了维持全家生计，大伯父基浚、二伯父基哲找到办理黄安县府 48 会中的“大有会”的户籍、田亩、钱粮册书的差使，从而获得些微薄收入，五叔基聪、七叔基智做些小买卖，而董必武的父亲和四叔教塾馆。这样，虽然家中人口多，但由于兄弟间互谅互让、齐心协力，全家也相处得和睦安乐。

董必武的父亲董基文，号采臣，在兄弟中排行第三。他自幼读书，1894 年科考得第一名，中了秀才。按照清朝的科举制度，考中秀才后，如果未能进一步考中举人，即使一直到发白皓首，也只能被视为“童生”。可惜的是，董基文考中秀才时，董家正日渐颓败，没有办理廪生资格的银钱，只补了个增生，称增广生员，不能领取廪食银，从而也断了做官之路，只能在乡里的塾馆或有钱人家里当一名私塾先生。董必武的父亲教了一辈子书，兢兢业业，

为人性情耿直，清贫自守，足不涉公门，并十分鄙视趋炎附势之辈，有陶渊明“不为五斗米折腰”的气节，这对董必武的性格和品德的形成影响很大。董基文对子女的教育十分严格，一向嘱咐子女正直为人，“莫做坏事”。他同情革命，对董必武从事革命活动，从不反对。董必武策动反袁斗争被捕入狱时，他四处奔走，设法营救。

董必武的四叔董基明，号素怀，知识渊博，写得一手好文章，才名著称县内。他考中秀才后，补了个廪生，称廪膳生员（能从国库中领取膳食的生员）。董基明大半生也是以教书为生，对董必武尤其喜爱，当董基文远出时，董基明帮助照料董必武。因此，他对董必武影响也是很大的。

董必武的母亲蔡氏，是位典型的旧中国的贤惠女性。她出身城市贫民，自幼到董家做童养媳。一生节俭勤劳，为给家庭增加收入，她白天纺纱织布，晚上在昏暗的油灯下继续劳作，有时彻夜不眠。她对一针一线、一草一木都十分珍惜，绝不容许损坏和浪费。她的这种热爱劳动、克勤克俭的作风，对董必武的成长影响是很大的。她生有两女两男，董必武是其长子，次子名贤珏、又名觉生。晚年，董必武曾向子女深情地回忆说：“我爸爸的家境贫苦，家里没有藏书，我要看书常到一位朋友家去借，因为借期很短，只得连夜看。那时晚上点的是清油灯，我和母亲共一盏灯，她摇纺车纺棉花，我在一旁看书。”言谈之中，对自己的双亲充满了无限的怀念和眷恋之情。

幼年时代的董必武，在这种生活勤俭和作风朴诚的家庭里，受到了良好的熏陶。由于生活的困难，幼时的董必武很早就懂事了，他经常到城外捡柴、挖野菜，帮助母亲喂鸡、搬运自织的土布。艰辛的生活和良好的家风，使董必武从小就养成了朴诚、正直、笃厚、刚毅的性格。

# 清 末 秀 才

得益于担任塾师的父亲和四叔，董必武自幼就受到良好的启蒙教育。教课余暇，他们出于“盼子成龙”的心情，谆谆地引导钟爱的小乐益读书和识字。

清代的启蒙教育,大多从《百家姓》、《三字经》、《千字文》开始。幼年的董必武，在父亲的指点下，就在昏暗的油灯下，伴随着母亲纺车的嗡嗡声，把《三字经》背得滚瓜烂熟。5 岁那年,父亲在黄安城内东街广善庵塾堂就教，董必武也经常跟随父亲去玩耍。一天，父亲让塾童背诵《三字经》，几个塾童背不出，正在窗外向里面偷望的董必武，立即代塾童朗声背起来：“人之初，性本善。性相近，习相远。……”背得一字不差。他父亲非常惊喜，从此就让他跟读。第二年，董必武又跟随父亲到距黄安县城 15 公里的李貌村（又名李冕二村）的塾堂就读，除继续读《论语》外，还读《大学》、《孟子》、《中庸》。7 岁时，父亲受聘到离家更远的东张煜村张家塾堂就教，因约定不带子女入学，董必武遂随四叔董基明到黄安城内易家私塾堂读书。 8 岁又随姑夫在黄安县东河寺读书。除了正课之外，在课余还借读了《三国演义》、《东周列国志》、《水浒》、《七侠五义》等演义小说。9 岁那年，得张家允许，董必武随父亲到东张煜村，与张家子弟一起就读，他又借读了《天雨花》、《孟丽君》、《二度梅》等长篇弹词和小说。10 岁、11 岁时，又随父亲转到麻城宋埠镇附近的张杰湾和黄安县傅董家村就读，除认真读经书外，课外还读了《西厢记》、《牡丹亭》等名作。虽然这种读书生活很不安定， 却使他开阔了眼界，知识增长很快。12 岁和 13 岁，他继续在傅董家村读书，开始熟读《尔雅》、《说文》、《古文释义》、《左传》、《通鉴辑览》等。14 岁起，董必武随

着父亲转到设在黄安县城福生祠董家家庙的县办萃英书院读书，一直到 18岁参加科举考试之前。在这里，他白天在书院跟班上课，晚上在油灯下阅读大量中国古代优秀文史书籍，如《史记》、《汉书》、《晋书》、《宋史》和《易经》、《淮南子》等历史著作,以及李白、杜甫、辛弃疾等人的诗词。通过对这些古代中华民族优秀文化著作的广博阅览，董必武打下了深厚的古文功底。

董必武的青少年时代，仍盛行科举制度，他也不知不觉地步入了读书——参加科举——做官的仕途。1900年,他 15岁时,参加了县里的“观风”考试，得了第二名。 16岁起，他开始练习写策论。17 岁参加全县会考,成绩又名列前茅,得到‘膏火’(即灯火费）奖励。因此，家中人都希望他考得功名，以改变家庭的贫困境况。

清朝的科举制度，沿袭明制。童生要参加入学、乡试、会试三次考试。入学考试又称小试、小考，包括县试、州试、府试，考试合格者称秀才。1903年，董必武先后参加了黄安县、黄州府科举考试，都榜上有名，获得附学生员（附生），中了秀才。他成为董家的又一名秀才。

在封建社会获取功名，是进入仕途的开始，是件值得庆贺的大喜事，更何况董必武是“贤”字辈的第一个秀才，因此，全家上下、邻里乡亲都喜上眉梢。按照当地风俗，在董必武回家的那一天，乡邻们到县城东门外准备大放鞭炮迎接他。可是，等了半晌，始终未见到他。原来他故意绕道回了家，别人问他为什么这样做，他只淡淡地笑着说：“中了秀才没什么了不起。”这也是他受淳朴家风的影响，对旧的俗套不以为然。几十年后，董必武向女儿谈起这件事说：“家中知道考中秀才的消息，自然高兴得很，他们计算着我几时回，买了爆竹，等候在城东口，准备一见到我就点炮。我得信后，就绕了路回到家里，没有在城东门与他们见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面。”女儿问他：“那为什么？”董必武笑着说：“为什么？为什么要接？我不想那样回家。”又说：“当然，考中了秀才，家里就免了杂税，这对家里来说，也是不轻的咧！”

## 初萌报国志

董必武的青少年时代，正是中华民族日益陷入危机的时代。1840年第一次鸦片战争后，西方列强连续不断地侵略中国，第二次鸦片战争、中法战争、甲午战争、八国联军的入侵……，列强强迫腐败无能的清政府签订了《南京条约》、《天津条约》、《北京条约》、《马关条约》、《辛丑条约》等一系列不平等条约,采取军事、经济、文化、宗教等侵略手段，逐步把殖民势力深入到中国的内陆腹地。号称“九省总汇之通衢”的湖北省，成为贪得无厌的列强争夺的重点地区，侵略魔爪，也伸进了地处大别山深处的黄安县。帝国主义和当地的封建势力相互勾结，一起贪婪地吮吸着劳动人民的血汗，再加上难以抵御的水旱等各种自然灾害，百姓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

中国人民是不甘于忍受外来侵略和封建压迫的。在董必武祖父经营“董家酱园”的时候，震惊中外的太平天国运动爆发了。在清咸丰四年（1854年）三四月间，太平军一部攻入黄安县城，消灭了驻守的团练兵，烧毁了清朝县知府的衙门，打开监狱释放了在押囚犯，惩办了贪官污吏。虽然后来太平天国革命失败了，但太平军在黄安的革命活动广为流传。年幼的董必武屡屡听到先辈们绘声绘色的述说，他感佩不已，太平军的革命活动深深地打动了他幼小的心灵。

1895年，董必武随父到麻城县张杰湾读书。距张杰湾不远的宋埠镇刚刚发生过的“宋埠教案”，对正在成长中的董必武产生了

很大的影响。

西方列强侵入中国后，凭借与清政府签订的不平等条约，取得了“传教自由”的权利。那些满口“自由、平等、博爱”的外国传教士，常常打着传教的幌子，在中国土地上横行霸道，无恶不作。忍无可忍的中国人民被迫反抗，于是爆发了一起又一起的“教案”。当时，在宋埠镇设有天主教堂，瑞典和意大利传教士在当地肆意欺压百姓，横行霸道，老百姓早已恨之入骨。那一年，一名传教士以传教为诱饵，霸占了一霍家的民女。消息传开后，当地人民十分愤怒，在宋埠镇两位“好打抱不平”的义士李金狗、徐全福带领下，趁端午节到宋埠镇观看会节的机会，当众击毙了那个传教士，并愤然烧毁了教堂。事情发生后，清朝政府明知那些传教士实属作恶多端，但屈服于帝国主义的压力，答应赔偿白银四万二千两，重修教堂，并从重处置“闹事者”。湖广总督唯恐下面办事不力，特派候补知府裕庚“驰往查办”，把为民除害的义士李金狗、徐全福处死，另有多人被判刑，并责打参与此事的许多老百姓。同时，到处张贴布告，声言要“千方百计保护教堂、教士、教民”，对于一切反抗教会无端行为的人，务须“严行缉拿，永远监禁。”

当地老百姓愤愤不平，就把这事编成了花鼓戏、皮影戏和大鼓书到处演唱，歌颂两位义士的勇敢机智和民族气节，表达对清政府和洋人的痛恨。正在张杰湾读书的董必武看到这些演出后，在他幼小心灵中产生了对横行霸道传教士的强烈憎恨和对农民英雄的无比崇敬。直至几十年后，董必武在谈到“宋埠教案”和张杰湾一段生活时，还说“印象深刻”[1]。

1898 年黄安的抢谷风潮也教育了董必武。这年黄安发生灾荒，粮食歉收，农民陷入严重的饥馑。土豪劣绅不但把持预备救灾的“丰豫仓”，而且乘机囤谷居奇，哄抬谷价。平时谷价每石不

过八百文，此时陡涨到两吊四百文（雇农全年工价才五吊）。皮匠出身、靠给藩台做工多年捐得官职的黄安知县，发布告示，规定谷价每石一吊六百文，并劝谕绅士及富户照价粜谷救荒。然而富户毫不理会，饥饿的百姓群情激愤，纷纷到大户家去抢谷。抢谷风潮席卷全县，反动当局竟派兵镇压，同情百姓的知县也被撤职查办。时在黄安农村读书的董必武耳闻目睹了这件事，加深了他对土豪劣绅、封建官府搜刮民财、置人民死活于不顾的反动本性的认识。

考中秀才，是董必武正式步入社会的开始。本来由此他或许走上科举取士做官的道路，但他科考中亲身经历的事情，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他后来的人生抉择，改变了他的生活道路。

黄州府科举考试曾出现考场风波。当时的湖北学政蒋式芬亲临主考，他命令门卫对考生严加检查。广济廪生饶汉莞拒绝检查，被学政喝令驱逐出场，遭恶役毒打致死，学政竟令抛尸灭迹。如此草菅人命，引起公愤，考生包围了贡院，控诉蒋学政。湖北抚台闻知，竟派兵前来镇压。董必武参加了这场斗争，对清朝官场的黑暗感触很深。

不久，董必武亲身遭遇了官府的毒手。考中秀才后，他到省城参加“乡试”。这是每隔 3 年在省城举行的考试，凡经县考、州试合格者，均可应考，考中者称为“举人”。董必武在家里作了充分准备后，于 8 月间跋涉 100 余公里来到省会武昌。从山区来到省会，他对各种事物都感到新鲜。一天，他路过抚台衙门，碰巧抚台正在升堂问事，董必武觉得好奇，便走到衙门口往里探视。衙役发现后，见他穿着破旧，便猛冲过来把他抓住，打翻在地，诬他“窥探官衙”。一阵毒打后，把董必武赶出老远。董必武无辜遭打，怒火满腔，愤而弃考回乡，“从此，恨死当官人。”后来，他向身边工作人员谈起这件事时说：经受那一次清朝衙役的毒打，使

他更看清了清王朝的腐败无能。

当时的湖北，正处于剧变的前夜。清朝后期洋务运动的代表人物张之洞于 1889 年（清光绪十五年）出任湖广总督后，在“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宗旨下，以“振兴实业”作为他“新政”的基础，积极倡导“变法之本，在育人才；人才之兴，在开学校”。1903年他创建了文普通中学堂、武普通中学堂等一批学堂。由于清朝日益腐败，知识分子走科举取士的仕途之路，已是相当艰难，投笔从军，成为有志青年的新选择。当时一些欲推翻清朝腐朽统治的革命志士，如刘静庵、张难先等，已开始在群众中宣传：“革命非运动军队不可；运动军队非亲身加入队伍不可”。革命勇士陈天华在《猛回头》中也写道：“有血性的男儿，从军最好。”

董必武弃考回乡不久，武普通中学堂开始招生。入军校深造，毕业后成为一名军人，曾是董必武的宿愿。现在机会来了，董必武经过仔细考虑，决心报考。他在时过 70 年后曾这样说：“我投考武普通学堂,就是想当兵,推翻清王朝。”1943 年元旦，他在怀念分别多年未见面的挚友潘怡如的五言律诗《怀怡如兄》中写道：“投笔从戎日，潜怀救国心，不甘胡虏政，始结汉同心。”充分反映了当年他投考武普通中学堂的真实动机。

赴武昌投考那天，董必武的心情既紧张又兴奋，还特意穿上了家中唯一的“礼服”——父亲的一件半新长衫。他本来想，凭自己的知识才能，考取是应当有把握的。但当他报名时，那位招考人员看到董必武长得黑瘦，又穿一件旧长衫，连说：“你年龄太大,不准报名。”董必武连忙辩解“:我今年刚刚 18 岁,正符合你们招贴上的要求。”但任凭董必武怎样解释，招考人员就是不信，连推带搡，把这位一心想当一名军人的青年赶出了考场。董必武只得再一次愤然离开武昌。这在董必武的心灵深处又增添了一份对清朝腐败政治的憎恨。

董必武在青少年时代所经历的这一件件事情，深深地影响着他。对帝国主义带给中华民族耻辱的仇恨，对清政府腐败统治的不满，已深深地埋在他的心底，成为他日后立志救国救民的思想动力。

## “文普”高材生

董必武报考武普通中学堂受挫后，返回家乡。为了分担家庭生活的负担，他在县城教蒙馆。这时，兴办新式学堂之风也吹到了黄安，他的四叔董基明在县城筹办了全县的最高学府——县立高等小学校，校址就在他幼时求学的私塾学堂——萃英书院。1904年董必武来到这所新学堂代四叔教课。由于他知识渊博，思想清新，授课认真，很快受到学生们的欢迎。

虽然已有职业，但出于追求新知识的强烈欲望，加上各种新思潮的冲击，董必武并没有放弃求学深造的念头，仍时时打探着各种学习的信息。1905 年春，经同县人阮毓崧介绍，他获悉武昌文普通中学堂要招考新生。他感到兴奋，立即说服父母和四叔同意让他去报考。经过严格考试，他以优异的成绩考入了文普通中学堂。

文普通中学堂，是当时湖北省的重点学校。张之洞为把这所新式学校办好，特聘其世交纪钜伟任该校监督（即校长）。该校学制 5 年，课程中西兼有，学生全部享受官费。

1905 年 11 月，董必武正式入学，被编入该校第二届的第三班。入学不久，教师命题让学生作文，题目是《伍子胥、申包胥合论》。董必武凭着渊博的文史知识，一气呵成。教师阅后，认为他文风典雅，内容深邃，语言凝练，“风格接近时居文坛之首的桐城派”，马上推荐给监督纪钜伟。纪阅后十分欣赏，亲笔批语：

“锲而不舍，他日必成文学家。”由于他文史基础好，经过几次考察后校方同意了董必武的申请，决定其免修一个学期的语文课。董必武得以较多的精力攻读数理和英文学科。

董必武非常珍惜这来之不易的学习机会，学习刻苦用功，考试成绩总列全班第一名，成为同学中的佼佼者。他品学兼优，深受监督和老师们的器重。

然而,董必武在‘文普’的学习并不是一帆风顺的。先是1908年，文普通中学堂改为湖北省立第一中学，学习由官费改为自费。这对家庭经济状况拮据的董必武来说，不啻是严峻的考验，全家大力支持他读书，靠着东挪西借和省吃俭用，董必武方才能够继续学业。接着，在1909年，省提学使提出要办文高等学堂，筹划把省立第一中学的这一届毕业生转为文高等学堂的第一期生员，并决定不按原规定发给董必武他们毕业证。这对早就企望凭一纸毕业证书寻找职业以养家糊口的学生来说，是个沉重的打击。大多数学生都反对提学使的决定，但担心闹事会被学校开除。董必武品学兼优，在师生中威信很高，学校找不到开除他的理由，同学们都推他领头。董必武深感同学对他的信任，他表示：不干则已，干就要破釜沉舟，坚决干到底。他率领同学到校监督室去论理。纪钜伟对董必武非常器重，董必武也了解监督是一位爱护青年的长辈，但觉得在拒发毕业证这件事情上，纪钜伟不理解学生的心情。他向纪钜伟申述了他们的要求，纪听了后觉得在理，但碍于决定非学校所为，只能表示同情而无法更改，后来干脆避而不见。在学校申述无效后，董必武带领同学到省咨议局去请愿。咨议局的权贵们开始并没有把这群青年放在眼里，一口拒绝了学生的请求。但董必武等齐心协力，坚持斗争一个月，终于迫使提学使收回成命，同意发给毕业证。在这场斗争中，董必武团结多数，坚持说理，讲究策略，使问题得到圆满的解决，初次显示了他的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组织领导才能，博得学校上下的称道，大家赞扬他“有毅力”。

一波刚平，又起一波。1910 年夏，董必武经过 4 年多的读书生活，迎来了毕业考试。省提学使不甘心上次的失败，企图借毕业考试来报复学生。提出由提学使代替学校出试题，结果毕业考试中数学题难得令人咋舌，竟是学生未学过的内容，以及课本上未见过的题型，造成许多同学成绩不及格，影响了毕业。同学们非常气愤，认为提学使有意报复，于是再次众推董必武为首，集体到提学使衙门请愿。同学们质问提学使：“为什么要出根本没有学过的题目，故意刁难我们？”提学使明知无理，只好答非所问，这更引起同学们的不满。董必武代表同学们据理力争，提学使被驳得哑口无言，最后答应重新改分，斗争取得了胜利。

1910年 10 月,经过艰苦的 5 年学习，董必武终于修业期满，以全年级最优等 5 名学生中的第一名毕业。当时的湖广总督瑞澂向清宣统皇帝上奏，保荐董必武为“拔贡”[2]（当时清政府虽已废除科举，但仍实行“拔贡”制）。这是当时对学业和品格最优等学生的最高奖赏和荣誉。做官的仕途又一次向董必武招手，但此时他已接受了旧民主主义思潮的影响，选择了从事救国救民、推翻清王朝统治的道路。

## 思想的洗礼

在“文普”就学的 5年里，董必武的思想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由朴素的“恨官吏”“恨洋人”“恨地主豪绅”的自发感情,逐步上升到走为劳苦大众谋幸福、推动中国社会前进之路的理智行动。在这其中，湖北资产阶级革命团体——日知会及其领导人刘静庵对他产生了深刻的影响。1937 年，在陕北董必武向采访他的美国进步作家海伦·斯诺谈起过这段历史。他说：

我到达武昌后，住在一个名 叫日知会的著名团体的宿舍里，日知会这个团体规模虽小，由于因刘静庵的人格，对当时的社会却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那里是领导辛亥革命的湖北省的初期革命中心。

日知会的前身是 1904 年 7 月 3 日正式成立的科学补习所,所址设在武昌多宝寺街。辛亥革命时期的风云人物胡瑛、宋教仁、曹亚伯分任总干事、文书和宣传。该所名义上是一个文化补习学校，其实是一个以“革命排满”为主要宗旨的、具有比较完善组织体系的秘密革命团体，与当时湖南长沙的华兴会有着密切的联系。刘静庵也是科学补习所的活跃成员，他 1875 年出生，湖北潜江人，清末秀才。因愤清政不纲于 1903 年弃文当兵，时为湖北新军马队管带黎元洪的书记官。

董必武考入文普通中学堂时，科学补习所已被清朝当局查封，刘静庵躲藏在日知会继续从事革命活动。日知会本来是美国基督教中华圣公会在武昌所设的阅报室，因圣公会会长胡兰亭与刘静庵很要好，刘静庵离开湖北新军后，胡兰亭便聘他为日知会习理，实际上是日知会负责人。刘静庵利用日知会这个阅报室的有利条件，广泛收集国内外报纸、杂志和新书籍，供人阅览，通过组织星期日演讲会、编唱歌曲、吟诗联句、做游戏、放幻灯、看电影等形式，宣传反对清朝统治的革命主张，联络革命志士。这样，武汉的革命党人和关心革命的仁人志士，一时纷纷云集那里。 1906 年 2 月，革命党人据此成立了新的“日知会”,它是一个新的秘密的革命团体。

1905 年，董必武在武昌等待入学期间，租住了一间私人小屋，经常到日知会阅读书报，并结识了刘静庵。从那时起，直至他毕

业，日知会这个阅览室就成了他吸取新思想、新知识的“第二课堂”。在那里，董必武结识了一些革命党人，其中有比董必武高一个年级的“文普”同学宋教仁、田桐、查光佛等。董必武虽然没有加入他们的秘密革命团体，却赞成他们的思想，同情他们的活动。通过与他们的接触交往和阅读日知会的进步书刊，董必武眼界大为开阔，思想急剧地变化。

日知会经常在星期六晚上和星期天举行演说。演讲人多是革命党人，演讲内容总是围绕着“耻莫大于国丧”这一主题。听众有时多达千人。董必武常常挤在人群中听讲，他对世界大势、中国的危机和当前的救亡之道都有了比较清晰的了解。一次，刘静庵亲自登台演讲，他慷慨激昂地讲道：“中国醒！中国醒！我中华大国，外国人要瓜分了，我们同胞要做双重亡国奴了！……那拉氏常言：宁将中国亡于外人，不可失于家奴。此满清亦自认中国也要亡了！我汉人四万万同胞，被满清压迫愚弄，多有不知的。现在迫在眉睫，应该醒来，应该觉悟，早想挽救之法，以免永为人之奴隶牛马”，我们要“救中国危亡，成立新中国，俾黄帝子孙不复为亡国奴，惟同志之幸，亦中国四万万同胞之幸”。这富有爱国精神的呼喊，道出了爱祖国、爱自由的四万万同胞的心声，也道出了董必武的心声。会场上说者大哭，听者落泪。董必武激动得彻夜不眠。

日知会为了进行革命宣传，还以“救亡图存”为主题，用普通白话编了军歌三首，先在武昌军队和学生中进行传唱，不久便风靡武昌各学堂，董必武亦为歌曲所打动。歌中唱道：“愿同胞，团结个，英雄气，唱军歌，一腔热血按剑摩。怎能够，坐视国步蹉跎。准备指日挥戈，好收拾旧山河。”“救国千钧担一肩挑，新中国能够造得更坚牢，便是绝代人豪，浩然气，薄云霄。”

更加打动董必武思想的是他在日知会阅读的一些秘密印刷

品。董必武第一次读到了陈天华的《猛回头》、《警世钟》,邹容的《革命军》，吴贡三的《孔孟心肝》等。这些书籍是由日知会在黄冈的秘密印刷厂印制，然后秘密在军人、学生中传读的。这时，刘静庵与董必武已经熟识，认为董必武是一个有作为的朴实青年，便主动给董必武介绍和提供书籍，每逢有宣传革命思想的书，都介绍给他。董必武如饥似渴地阅读着，当读到《猛回头》、《警世钟》时，他感动万分，反复吟咏着：“长梦千年何日醒，睡乡谁遣警钟鸣；腥风血雨难为我，好个江山忍送人？”深深为陈天华的爱国思想所感染。经刘静庵介绍和指点，董必武又读了被清政府查禁的《扬州十日记》和《嘉定屠城记》。从而进一步激发了他推翻清王朝统治的决心。

但是，如何驱逐帝国主义列强、推翻清王朝反动统治呢？路在何方？董必武在认真思考、寻觅着。起初，他读到康有为提倡维新运动的书和梁启超主编的《新民丛报》，对他们宣扬的改革朝政、变法图强的主张感到十分新鲜，觉得对自己产生了“启蒙作用”。后来，董必武又看到同盟会在日本东京出版的机关报《民报》，觉得同盟会“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建立民国，平均地权”的革命纲领，很合自己的想法，认为其目标明确，符合民意。当时，资产阶级革命派和改良派正以《民报》和《新民丛报》为主要阵地，进行大论战。孙中山在《民报》发刊词里公开提出“民族、民权、民生”三大主义，号召实行民族民主革命。《民报》连续发表了批驳改良派的文章。董必武以严肃的态度，认真研究两派的纲领和主张。经过反复思考和鉴别，他认识到康、梁的主张虽有进步的地方，但终究冲不出清朝帝制统治的范围；而孙中山采取革命手段推翻清朝统治、建立民主共和国的主张，是适应世界潮流和中国国情的先进纲领。董必武后来回忆说，他从《民报》与《新民丛报》 12 条根本分歧中，认识到康、梁的主张是非

革命的。他开始感到《新民丛报》的观念“浮薄”，后来看到改良派办的《庸言》“更断其落后”。

与此同时，社会现实和爱国斗争也在深化着董必武的思想认识。

近代以来，日本帝国主义是中国人民最凶恶的敌人。中国留日学生身临其境，痛感民族危机，掀起了一次次的爱国救亡热潮，对国内人民产生了很大的震撼和促醒作用。董必武从日知会的报刊杂志和秘密书籍中获悉：1904 年 4 月，留日学生声讨沙俄罪行，组织拒俄义勇队和军国民教育会，由拒俄御侮发展到武力反清；1905 年，鄂湘粤三省人民发起收回粤汉路权运动，留日学生也为此组成鄂湘粤三省铁路联合会，积极开展斗争；同年 12 月，为抗议日本内阁文部省拟定的取缔留日学生规则，中国留日学生 8000 多人实行总罢课，有 200 多人弃学回国，《警世钟》、《猛回头》的作者陈天华愤而投海，以死抗议。这些斗争，犹似大海的波涛，冲击着孜孜探求革命真理的董必武，使他确信中国只能走革命而不是改良之路。

1906 年 10 月，同盟会在湖南萍（乡）浏（阳）醴（陵）发动起义。孙中山派人与刘静庵、梁钟汉联系， 让湖北也策动起义以作响应。正在筹备之际，接近日知会的郭尧阶向武昌巡警道冯启钧告密。冯于 1907 年 1 月大肆逮捕日知会成员，刘静庵、殷子衡、张难先等 9 人先后被捕入狱。为逼迫刘静庵供出联系湖南革命党密谋起义一事，冯启钧动用各种刑具对刘静庵施以苦刑，打得他“血肉横飞，肉尽骨见，死而复生数次”；“自首至踵趾无寸肤完”，但刘静庵始终“颈挺不稍回曲”；“慷慨言中国危殆”，被人称誉为“铁汉”。清廷未能从刘静庵口中得到任何密谋起义的证据，只好把他投入监狱长期监禁，1911 年瘐死狱中。刘静庵勇斗法庭的事迹广泛流传，正直的人们为之扼腕痛惜，视刘静庵是自己“启蒙

师”的董必武更是激愤万分。刘静庵的忠贞救国和坚韧不屈、清廷的惨无人道和暴虐统治，加速了董必武思想的转化。

面对人民的愤怒反对，清朝统治岌岌可危。为了保存其摇摇欲坠的政权，防止发生革命，统治朝政 20 多年、将中国带入灾难深渊的慈禧太后，也作出了实行“新政”的姿态，表示要“预备立宪”。1907 年，湖北省开始筹备咨议局。1909 年，湖北举行了咨议局选举。选举结果仍是清朝的旧官僚当选为议长、副议长，而政治腐败依旧，老百姓生活依然艰难。现实生活再次使董必武认识到，梁启超等人鼓吹的君主立宪是不可能给百姓带来好处的，改良的道路挽救不了中国。

经过抉择，董必武毅然抛弃了康、梁君主立宪的改良主义思想，转变成为一个革命民主主义者。

## 走向社会的躁动

中学毕业后，董必武面临着新的生活选择。

出于对清朝腐朽统治的极端憎恶，他不想步入官场，虽然仕途已经展现。他热切的愿望是升入文高等学堂学习，钟爱他的师长们也希望他继续深造。但是，他的家境每况愈下，再也无力供养他上学了。面对现实，董必武体谅家中的艰难，怀着对母校的眷恋，离开武昌返回家乡了。

这年，董必武已经 25 岁了，已到了“男大当婚”的年龄。回家后不久，他与本县高桥镇黄家田村的黄俊贞[3]结婚。这位黄女士，没有读过书，心地善良，对董必武很温顺体贴。董必武也很同情她，帮助她学习文化。俩人婚后感情很好，曾有一个男孩，可惜幼年夭折了。

她同情革命，对董必武的革命工作，给予了极大的支持，大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